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 服务型执政党的探索^{*}

梁晓宇^{**}

【摘要】建设服务型执政党，是党的建设历史纵向的展开。中国共产党就对建设服务型执政党进行了长期的接力探索，在接力探索的过程中，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服务理念的形成、确保服务主体的纯洁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梳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服务型执政党建设的历程，揭示其具体的实践要求，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搞好服务型执政党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服务型执政党 为人民服务

一 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一向倡导党和国家机关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过‘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群众服务’、‘为人类服务’等提法，但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①

^{*} 该文系 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程、经验与路径研究”（18YJC710110）的阶段成果。

^{**} 梁晓宇，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与统战理论研究。

^① 梁柱 《试论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和反特权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 年第 11 期。

(一) 树立了权力主体的人民观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一直宣扬的是“君权神授”，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压榨劳动人民，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否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践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并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党的领导人最早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论述见于1939年2月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①为了让共产党员更深刻地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陈云提出了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六条标准：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第五，群众模范；第六，学习。这六条标准都指向了一个价值归宿——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向人民学习。

正确认识权力是谁授予的，该怎样使用手中的权力，是执政党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本身毛泽东就作过回答。我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就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深入正确的“权力观”教育。他说“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②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掌握好权力，用好权力，必须用权力为人民服务，决不允许将权力异化为个人或者小团体的权力。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③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直接选举，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到了选民总数的80%以上，这样大规模的选举对于动员民众、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不断赋予人民群众以民主政治权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1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28页。

利，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抗日民主政权也成为模范政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样，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得到了法律确认，具备了法律效力。当然，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其主体是大多数人，切实维护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目的，也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本质规定，具有人民性和公共性。1953年3月，在全国范围开始组织基层普选，并于1954年正式过渡到了人民代表大会，这就为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二）树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利益观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把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的位置，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可见，党一直把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放在自己的心中。毛泽东在1925年就指出“为什么要革命？就是为了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服务型政党这一概念，但是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在为领导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树立正确利益观、加强作风建设方面做出了艰辛的探索，而这一探索过程，也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的探索。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第3页。

党”^①，这就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开端。

1944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同时，他第一次在“为人民服务”的前面加上了“全心全意”四个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的探索与实践过程，就是把人民高兴和满意的政策与策略贯彻落实的过程，也是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给人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的过程”。^②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要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他要求党的干部“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③。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④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地明白，我们党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根本任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⑤在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就提出要“放弃一切老式的、过时的制度和工作方法，依靠人民，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由人民建立并为人民工作的政府。”^⑥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强调全党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高管理国家和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始终做好人民的勤务员。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党代表人民执掌国家公共权力的原则，“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绝不可以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⑦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02页。

② 熊辉、王孔容《毛泽东执政思想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第4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2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0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5~1096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32页。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56页。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的公仆意识更加强烈，他告诫全党“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经工作直接地或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①他还指出了利益调节要坚持为多数人的原则，“如果个人或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不冲突时，即大多数加少数；如果个人或少数人与大多数人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宗旨，而且把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善联系在一起，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周恩来告诫所有国家机关干部“我们的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③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外，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刘少奇指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党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现。”^④这就表明，共产党员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以及整个民族利益的最好代表者。

党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出发，始终把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要求和政权建设的基本方针，实践着人民利益至上的利益观，创造出了一系列丰功伟绩。如：经济上依靠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能力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粮食稳定增长，交通水利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外交上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在社会建设上，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丑恶现象；在科技方面，“两弹一星”的成功等等。

（三）树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策观”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42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05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20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134页。

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中国共产党把政策和策略视为党的生命，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关乎能否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全局性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符合实际地制定出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极大保证和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进而充分调动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这是因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②

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党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以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成，是否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否顾及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不但制定了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制定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诸如全面抗战路线、‘三三制’的政权政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及劳动、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这些政策无不透出强烈的人民性、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③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只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将边区治理好，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保证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④

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执行政策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坚决杜绝左和右的两种倾向，及时纠正脱离实际的政策，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1941年6月，延川县代县长不幸在开会时候触电身亡，一个农民拴在开会礼堂的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位农民借此发泄到，雷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79页。

② 路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第47页。

③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第8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8页。

电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此事后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并准备审查。毛泽东知道事情之后急忙制止并要求立即放人。同时，毛泽东在反复思考，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在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毛泽东立即着手走访群众调查实际情况，经过调研发现，陕甘宁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人口虽然只有一百四十多万，却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人员，土地贫瘠，自然灾害最近几年比较多，人民群众的粮食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1940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不给边区政府提供援助，边区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购买粮食。边区政府只好加大了对人民群众的征粮力度，农民的公粮负担由1939年的5万担增加到了1940年的9万担。1941年又增加到了20万担，人民群众由此怨气很大。党中央立即调整了征粮政策，经过边区政府认真研究，做出了削减公粮4万担的决定”。^①后来，在弄清楚事情背后的真实原因后，毛泽东意识到，要想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密切联系群众，党政干部就必须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全体党政军机关人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八路军359旅也随之开辟了南泥湾。同时，党中央也采取了民主人士李鼎铭“精兵简政”的提案，在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的政策。这一系列正确政策的贯彻执行，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经济负担，边区很快就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群众的上访和批评能够给予极大的宽容和理解，他们把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看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渠道，看作群众对党和政府监督的一种表现。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后，解放区随之开展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到了1949年初，一亿多农民分到了三亿多亩的土地。解放区出现了生产、参军和支援前线的热潮，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②美国记者韩丁亲身经历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他真诚地

① 梁晓宇《领导干部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73页。

评价道“中共1947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①正是由于党真心真意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之外，还主动解决群众的具体生产生活问题，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

二 严明党纪军纪，打造一支纪律严明的服务队伍

党的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在成立之初，就制定出了严格的纪律。如：所有党员都要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地方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接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必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这些纪律方面的要求对统一全党行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从建党之初一直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在带着队伍上井冈山的途中，毛泽东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士随便拿老百姓的红薯来充饥，他开始思考红军纪律问题。他后来对战士们说“我们要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②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③但是由于土地革命时期，党还不善于科学运用党的纪律手段以达到加强党的建设的目的，由于认识不足、经验缺乏，结果出现了两种偏向：其一是平时忽视了对党员的纪律教育，执行纪律不严格；其二是不区分党员犯错误的程度，滥用惩办制度。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在瑞金召开中共苏区党代会之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开始得到纠正。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一方面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纪律教育；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了党的纪律监察机构，对违反党纪者予以严肃处理。中共中央于1933年9

① 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99页。

②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1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5页。

月17日做出了决议，决定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之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的职责为“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地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①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监察委员会，在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和纪律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加强的纪律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②

后来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专门就党的纪律问题做了论述。他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斗争。”^③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全党遵守组织纪律概括为“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既肯定了党员对党内事务当家做主的权利，又严格要求党员必须履行实现多数人意志的义务，全面反映了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既保证了民主，又保证了集中，是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的最基本的准则，是全党必须遵守的组织纪律。第一，关于个人服从组织。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在决定问题之前，党员可以发表个人意见，但在党组织做出决定之后，就必须坚决服从。共产党员必须深刻理解组织的重要性，不能把个人置于组织之外，更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唯有如此，党才能够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的、有战斗力的整体。第二，少数服从多数。“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④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意味着忽视少数人的意见。相反，党的纪律是既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又要做到允许少数人保留不同意见，以利于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坚持真理。第三，下级服从上级。“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34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0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5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0页。

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①下级服从上级是保证党集中统一、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原则。针对部分下级机关不遵守党的纪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做法,毛泽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②第四,全党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自觉地维护中央的权威,坚定地支持、拥护和服从中央的决定。在1948年,全国胜利在望,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③的战斗口号,要求全党同无纪律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总之,“四个服从”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要求,是正确处理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关系的纪律保证,也是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基本原则。

有了铁的纪律作保证,党和人民军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血与火的峥嵘岁月,磨砺着党从幼稚走向成熟,反腐倡廉赢得了民心。

我们党在艰苦环境下播下的种子,一定会结出美丽的硕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艰苦的背景下对党和军队做出的特殊纪律要求,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时期便结出了美丽的硕果。苹果里面出精神的故事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这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④

党的纪律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重要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因为人民群众看到纪律严明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为其创造美好的未来。在新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23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9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4页。

期新阶段，应该不断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严肃处理违反党纪的组织和个人，不断加强党的纪律教育。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有的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展开，但是其中的一些核心内容却为新时期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明了方向，也为党的廉政为民思想奠定了理论和实践根基，为我们今天坚持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提供了历史的明镜”^①，对当今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借鉴作用。

三 严守服务道德，带头垂范，反对特殊化

“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② 毛泽东是我们树立良好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在井冈山时期，他时刻想着贫苦农民，在寒冷的冬天把自己的棉衣送给农民。“毛泽东认为，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与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凡是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一定解决不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定严重受损”。^③ 在井冈山，毛泽东、朱德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每天只有五分钱的伙食费，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粮食紧张时候，还带头吃野菜。他们身先士卒，与普通战士一起参与劳动，共渡难关，极大地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后来，毛泽东于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感慨地提到了当年异常艰苦的战斗环境。

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生活非常简朴。毛泽东指挥作战、率军行动的时候，与红军指战员一起爬山越岭，徒步行军，并经常将自己的坐骑让给红军伤病员用。1934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与警卫员、江西军区参谋长到长胜县做调查研究，这期间按照规定也缴纳了食宿费。几十年后，存于瑞金纪念馆的当年伙食账本上清楚地记载着“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膳宿费

① 梁晓宇《毛泽东对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之开拓性贡献》，《知与行》2017年第1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2页。

③ 颜清阳《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及其现实意义》，《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

壹圆捌角。经手人：陈奇涵”。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主席，在红军队伍中一点也不特殊、不显眼，不熟悉他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红军的最高统帅。开国上将肖华参加红军后担任了红四军军委的青年委员，他回忆了当时和朱德总司令谈话的情形。“经毛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总。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和蔼可亲”。^①《红色中华》编辑部于1934年3月13日向全体苏区军民发出了“为四个月节省捌拾万元而斗争”的口号，一周后就收到了陈云、博古、邓颖超等二十余位从白区到苏区工作同志的联名信。他们在信中声明，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愿意每天节省二两米。张闻天、刘少奇、项英等同志都带头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延安时期，毛泽东布衣草履，素食茶饭，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一起吃同样的小米饭，穿同样的补丁衣服，享受同样的生活标准，并且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经常忘我地工作，警卫人员见毛泽东总是穿着打着补丁的单薄棉衣，利用雪天为其打了一些银狐，为他做了一件狐皮大衣，可毛泽东却婉言谢绝，并建议把珍贵的狐皮大衣卖到国统区，为延安换回一些紧缺的物品。周恩来和任弼时都参加了纺织生产比赛，两人还被评为纺线能手。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作为边区政府主席，两袖清风，住在旧窑洞里，身体虚弱，仍拄着拐杖坚持深入农户家，嘘寒问暖、了解实情。朱德自觉参加大生产运动，经常背着粪筐拾粪积肥，驻扎到王家坪后，还开垦了3亩地，种了10余种蔬菜，种植的大南瓜还在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得到了展览，使参观者备受感动和敬佩”。^②一位老延安人回忆道“延安时期那么纯朴、那么美好的生活气氛，就是大家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妙的生活，新的中国与世界。生活虽苦，但苦在体肤，乐在其中。”^③中国共产党人用坚强的党性塑造出了优良的党风，用“延安作风”代替了“南京作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

① 肖华《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50页。

② 梁晓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知与行》2015年第3期。

③ 郭德宏主编《永恒的延安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63页。

象!连美军观察组都发出感叹“延安使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在进驻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亲自到田间地头指导老百姓种水稻,全国土地会议参会代表的马啃了老百姓的树皮,刘少奇亲自派人核实并予以赔偿。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长期过着简朴的生活,不搞特殊化。“毛泽东不但不为自己搞特殊化,也同样不允许亲属、子女谋取特殊待遇。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的舅家文家,常有人到北京探望毛泽东,回去之后有些人则以自己是毛泽东的亲属自居,骄傲起来,不服政府管。为此,毛泽东致信地方党委、政府,强调他的亲戚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①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七个月没有吃肉,也不喝茶。当时全国各级党的干部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影响带动下,都与群众共甘苦共患难,这种伟大的榜样力量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广大人民群众。1956年以后,刘少奇到基层视察的次数特别多,差不多一年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础。每次外出,行前他总要嘱咐随行人员到外面不准向人家提要求、接受礼物,不要让人家接送。那时候,按照国家的规定,刘少奇外出要坐专列火车。每到一个地方,当地政府总是安排他住高级宾馆。但是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经常吃住都在火车上。1960年5月中旬,刘少奇视察河南、陕西、四川后,带领几名水利专家,从重庆乘“江峡”号顺江而下,考察长江流域。在刘少奇考察途中的一天傍晚,其客轮所在区域遭遇了龙卷风,一场暴雨倾盆而下。离刘少奇的客轮不远处的几条小木船跌落在浪谷里,喊救人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了出来。有人提议赶快救人,有人说,我们的客轮偏离航道救人的话时刻会有被大浪冲翻的危险,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刘主席的绝对安全,客轮不能轻举妄动。而此时,刘少奇正在船舱里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对船舱外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当随行人员把情况向他报告后,刘少奇立即站起来,当机立断地说“就是因为这是国家主席的船,更应该抢救落水群众,请船长指挥,立即行动!”说着大步走出船舱。船员们和工作人员看

^① 陈小林、许立《毛泽东反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到刘少奇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都立即投入奋力抢险中。最终，落水者被一个个从死亡线上救了上来。1961年刘少奇去东北大小兴安岭视察林区，前后一个多月，他一直吃住在火车上。铁道部门有个规定，遇到专列通过，沿途客货车都要让路，以保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刘少奇对此很注意，每次都嘱咐秘书转告有关人员，不要影响客运车辆的正常运行，以免影响群众的旅行。他总是让秘书转告铁道部门，停车要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周恩来要求领导干部要知足常乐，他带头“过生活关”。生活关，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物质生活方面，要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奋斗成为我们的美德”。^①在实践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长期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从不追求生活上的奢华，并叮嘱自己的亲属要扎根于本职工作，一切按照原则办事，不能受到特殊对待。当他发现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开始以功劳自居，认为革命任务已经成功，可以放松警惕，降低对自身的要求，开始贪图享乐，心痛不已。他大声疾呼：“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应该做出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②他强调党的干部要保持政治本色，重申干部的地位和角色，干部“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殊化，“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④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拒绝诱惑吧，那样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做出崇高的事情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建构了一个强大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网络，从而同最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最为密切的联系，使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27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27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22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19页。

四 坚决惩治党内腐败问题，确保服务主体的纯洁

毛泽东一直视官僚主义是服务型执政党最大的隐患。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在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一直强调反腐和反官僚主义问题。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还创办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报刊，这些报刊专门开辟了相关专栏，对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评。在特殊的环境下，毛泽东对党内腐败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对于触犯苏维埃刑律的贪污腐化分子，不论职务高低，一律绳之以法，绝不姑息迁就。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部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1932年起中央苏区开始开展检举运动，先后有42名贪污分子被检举揭发。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1932年5月9日打响了惩腐第一枪——枪毙了犯有谋财害命、强奸妇女、贪污腐化等罪行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1933年12月，毛泽东和项英联合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明确规定：凡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苏区货币，当时1元约可买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官兵伙食费不含粮食每人每天5分左右）以上者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劳改。“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玩忽职守，管理不善，存放不妥，造成损失，轻者重罚，重者法办。”

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的两年时间内，中央苏区共查处贪污腐败案件200余起，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共15个。经过了第一次反腐败斗争的洗礼，中央苏区广大干部党员都自觉地把自已置身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精神在党内蔚然成风。杀人是无奈的选择，贪官是杀不完的，因此，共产党必须依靠群众路线来发动群众，才能有效地监督干部、制约干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组织法》规定“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最德谟克拉西的政权机关，她不仅最接近劳苦群众，与群众关系最密切，而且最易受群众的监督，决不至离开群众的实际生活而独立存在，或因与群众隔离而形成官僚化的机关。”^① 审计委员会在长征前夕发布报告，

^① 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4页。

指出“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在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依法治吏反腐，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管理公职人员的制度。“《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①对腐败的零容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惩治腐败的决心。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仅1937年至1938年间，边区政府就严肃严格判处了180起贪污腐化案件。

党对执政后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毛泽东还多次专门作了强调，为全党敲了警钟，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为了避免中国共产党出现“其亡也忽焉”的悲剧，毛泽东富有远见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②“两个务必”的提出，标志着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毛泽东为何总是让人怀念？因为他“疾恶如仇，铁腕反腐”。刘少奇同志也在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论述了拒腐防变的问题，他还郑重地指出“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③这深刻地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了高度的警觉。但是，随着执政后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增长，党内很快出现了腐败问题。“西北局书记习仲

①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第1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8、1439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413页。

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①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回来，回到了哈尔滨，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内考察。在哈尔滨吃饭，当地招待得非常丰盛，毛泽东当即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② 2月28日，沈阳的午餐安排得比哈尔滨更好，但是由于胡志明在场陪同，毛泽东只是象征性地用了餐，并没有完全拒绝。仅仅在1950年，仅华北地区发现和查处贪污腐化干部就多达303人，到了1951年增至531人。1951年9月，东北地区在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中又查出一些干部有严重贪污行为，同年11月，东北局书记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仅沈阳市部分单位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许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败的方针。”^③ 成为执政党之后，党中央对消极腐败现象的危害性，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党中央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充分认识新形势，对自己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从而自觉地经受考验，从思想上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5月，中共中央共计发出了300多道打“虎”令（虎是对贪污犯的称呼）。

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26日，党中央又做出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的指示》。“据中纪委截至1952年7月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

① 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79页。
② 李家冀、杨庆旺《我做毛泽东卫士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82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8，第524页。

于地委一级干部 576 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 3428 人”。^①

1952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成为惩处贪污分子的法律依据。在 20 世纪 50 年代，国内一些地方发生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要求退社的事件，这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这些事件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把 20 世纪 50 年代群众“闹事”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干部官僚主义、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和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八大党章都强调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号召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决抵制糖衣炮弹的侵袭，要用极大的努力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能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后来，他还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反腐运动，最显著的特点是反腐败的彻底性和有效性。为了增强反腐败的效果，把更多的“老虎”揪出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强调，无论是日常的反腐败斗争，还是进行反腐败运动，都必须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斗争，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社会民主人士等都动员起来，积极行动，铲除腐败。党中央进一步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站在运动前头领导群众，既不要害怕、阻止群众斗争，又要适时引导、纠偏，使群众运动健康发展，既要教育群众，又要改善自己的领导地位。由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做得好，不但腐败现象、腐败分子被有效揭露清除，而且形成了强大的群众力量。这不但能有效防止贪污腐败再次泛滥，而且能及时发现、迅速挽救新的腐败分子。新中国初期的一系列反腐措施取得了重大成果，有效地遏制了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初期所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党风和社会风气全面好转。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弘扬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着力整治庸懒散奢，以优良党风凝聚党

① 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86~18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78页。

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学习毛泽东带头树立良好作风、克服享乐主义、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思想，对于今天整治党风官德、化解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梁柱 《试论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和反特权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11期。
-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
-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
-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 熊辉、王孔容 《毛泽东执政思想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
-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
- 路易斯·惠勒·斯诺 《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
-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 《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梁晓宇 《领导干部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
-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
-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 余伯流、陈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
- 梁晓宇 《毛泽东对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之开拓性贡献》，《知与行》2017年第1期。
- 颜清阳 《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及其现实意义》，《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
- 肖华 《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梁晓宇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知与行》2015 年第 3 期。

郭德宏主编《永恒的延安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陈小林、许立 《毛泽东反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王关兴、陈挥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李家冀、杨庆旺 《我做毛泽东卫士 13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人民出版社，1988。

Endeavor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PC Central Leadership to Develop a Service-Oriented Ruling Party

Liang Xiaoyu

Abstract: Building a service-oriented ruling party is a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ince its founding, CPC has been studying how to build a service-oriented ruling part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ts central leadership has made undeniable contribution to developing the idea and maintaining its purity as the service subject. This year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worthy of reference to review the journey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PC central leadership to build a service-oriented ruling party by digging up its principles from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PC Central Leadership; Service-Oriented Ruling Party; Serve the People